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

□ 李永康



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是在对中国传统忧患意识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中与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忧患意识已经融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血液里，成为了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品质。

毛泽东忧患意识的产生动因

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早在韶山读书时期，毛泽东就阅读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进步书籍，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血腥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其中有一句“呜呼，中国将其亡矣！”这令少年毛泽东忧心如焚。走出韶山冲，来到省城长沙的毛泽东更是认识到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此时，正值青年的毛泽东，面对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危机四伏的状况，萌生了忧国忧民的意识并逐渐确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用史记中的古训告诫全党切记要谦虚谨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懂得“大贾深藏若虚”。他说：“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毛泽东一方面赞赏李自成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骄傲是万万不行的。因此，毛泽东称中共中央入驻北平是“进京赶考”，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忧患意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执政兴国的实际需要。在抗日战争中，党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环境，党员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小生产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因而带来了许多散漫的自由主义倾向，为此毛泽东在1937年9月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指出许多干部“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起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告诫广大干部要树立谦虚谨慎的忧患意识。抗战胜利后，许多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国

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具所迷惑，对此毛泽东1945年8月动身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前，告诫全党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慢慢变得懈怠，开始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一些人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因而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中，明确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并且有所超越，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这让许多干部感到得意扬扬，变得更加急躁冒进。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语重心长地说：“即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对国内外形势的清晰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有一个清晰把握，他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认识到，一定要实现工业化，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开除“球

籍”的危险。针对一穷二白的状况，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彻底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忧患意识的方法论

正确对待忧患。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劳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毛泽东认为，忧患是客观存在的，在人们的生活中忧患无处不在，人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它而不是逃避它。因为在他眼里，忧患并不是一件坏事，常怀忧患之心可以增强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可以促使人们更加谨慎地思考，可以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把困难想得更多些。顺利时不能麻痹懈怠，要多思考不利因素，安逸时不能贪图享乐，要回忆困难的经历，同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来应对防

范各种不测事件，把困难想得更多些，这是保持忧患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囚笼”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不容乐观，毛泽东指出，“目前尤其是以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要充分考虑到各种困难，比如考虑到根据地将会不断缩小，物资供应将会更加紧张等多方面的困难，从而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新政策，这是毛泽东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同时，毛泽东时常提醒人们不能忘乎所以，盲目乐观，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心理、物质准备，去迎接挑战，战胜困难。1945年10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重庆谈判》一文，指出：“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

学会多总结经验教训。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其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思远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了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例子还有很多，可见在困难发生之前防患于未然固然重要，在困难发生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也同样不可缺少。忧患意识既要防患于未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从而避免错误的再次发生。

（摘自2019年第2期《党史博采》，原标题为《浅析毛泽东的忧患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成效是显著的。同时要清醒看到，一些已经解决的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防范化解党自身面临的风险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尤其要着力防范以下重大风险。

脱离群众、根基动摇的风险。人心向背决定着政党的前途命运，决定着政党执政的兴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广泛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力量源泉。

多措并举促进党员干部练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基本功。现在，不会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不在少数。对此，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尽快补齐这一短板，包括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特点和规律；运用好基层一线、复杂环境、艰苦地区、重大建设工程这些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落实好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各项具体制度；加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上下交流力度；等等。确保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常接地气、情系百姓。

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党员干部作风形象是反映民心向背最灵敏的晴雨表。要坚持精准发力、靶向治疗，科学研判作风建设现状，抓住改作风转作风中的薄弱环节，聚焦影响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采取过硬措施，集中火力、持续用劲，推动作风建设不断走向深入。

心存侥幸、祸起萧墙的风险。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我们对党员一以贯之的要求。随着党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影响党员忠诚度的因素日益增多，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丧失原则、突破底线，这是党内重大隐患，必须高度警惕、重点防范。

严把干部选用政治关，才能从源头上减少隐患。应多角度全方位考准考实干部的政治素质，把功夫下在平地里、下在关键时、下在深入上。既看其口头上怎么讲、笔头上怎么写，更看其行动上怎么做；既看一时一事的表现，更看一以贯之的表现；既看顺风顺水时的作为，更看大是大非面前和关键时刻的担当。

强化忠诚教育，是减少隐患的基础性工作。要教育引导党员深刻认识到，对党忠诚既是义务也是本色，既是价值理念也是行为规范，既要植根于灵魂又要见之于行动，真正把忠诚体现到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党的组织、忠于党的宗旨上，时刻印到履职尽责、为官用权、工作生活的点滴细微处。同时，党组织应积极营造民主和谐的良好氛围，发扬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对组织充分信赖、真心依靠。

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风险。具有严明的纪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现实中，无视党纪、违规破纪的现象仍然存在，组织体系不完善、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仍然突出，严重影响党的战斗力，这是我们党必须着力防范化解的重大风险。

以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要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促进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是防止组织涣散的治本之策。要建强中央组织，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贯穿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过程。要建好地方党委和党组这个“中间层”，以贯彻问题为导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巩固执政的组织基础。

不负责任、碌碌无为的风险。不负责任、碌碌无为的关键时

党自身面临的重大风险

□ 田哲

期，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整治乱作为上取得明显成效，但不愿作为、不敢作为、不会作为的问题仍然存在。防范化解不负责任、碌碌无为的风险尤为紧迫。

大力弘扬实干精神。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埋头苦干、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上，用在破难题、克难关、解民忧上，用在为人民而不、不为个人升迁而干的价值追求上。

进一步规范问责。进一步规范问责，严格设置问责门槛，严格规定问责条件和程序，严格规定问责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对情节较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没有必要纳入问责范围，而是应通过批评教育、总结教训、加快整改等来解决，坚决防止和克服吹毛求疵、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错误倾向。

腐化堕落、异化变质的风险。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最大风险、最大挑战。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情况看，腐败不收敛不收手现象仍然存在，存量没有减完，增量还在增长。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保持不敢腐的震慑。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对腐败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多少查处多少，决不让腐败分子有生存空间。要着力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案件，紧盯事关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努力实现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同时，要根据腐败易发高发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岗位，查找风险点，用制度堵塞漏洞。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大道、守边界，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始终把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秉公用人、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勤修炼、强定力，祛除私心杂念，提高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不断增强政治定力、道德定力、抵御定力。

（摘自2019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

『苏区干部好作风——一首山歌唱出』

□ 李晓巧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
夜打火把访贫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诞生，在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史上一般称为“中央苏区”。当年群众以他们习惯的朗朗上口的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山歌再现了中央苏区干部的工作作风。

“日穿草鞋干革命”，唱出了艰苦朴素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山歌中唱的“日穿草鞋干革命”



正是当时特殊岁月中，革命干部艰苦奋斗的一段真实写照。苏区干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国为民情怀，从而赢得了广大苏区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自带干粮去办公”，唱出了清正廉洁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就提出了反腐败，指出必须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密切党群关系。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这些法律的颁布，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并制度化地严格执行，在当年苏区的《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屡屡可见关于反腐败的报道。

“夜打火把访贫农”，唱出了一心为民、努力干事是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在江西方言里“埃”有“我”的意思，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政权被苏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埃政府”，就是“我的政府”的意思。因为苏区人民打心眼里认定苏维埃政府是“我们的政府”，他们才会把“最后一碗米，送去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作军装；最后一个娃，送他上战场”。这是当时的党和苏区政府带领干部们一心为民、真抓实干而得到的人民群众的最好回报。

（摘自2017年第14期《群众》）

苏区反腐第一枪

□ 左连璧

对于谢步升这个名字，人们可能不是很熟悉，但他却是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因贪腐罪行被判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第一人。正因为此案的诸多警示，革命根据地才掀起了一场“反腐、肃贪、倡廉”的行动。谢步升案的查处还表明，我党在红色政权建设伊始，就十分注意严惩党内腐败，在其后的光辉历程中，对反腐败丝毫没有放松过，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主席为毛泽东。此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于旧思想、旧风俗势力的侵扰之中，有些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因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注重自身廉洁。再加上制度也不够健全，给了一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导致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风较为严重。针对此种情况，从1932年初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

1932年2月，中央苏区政府会议作出决定，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进行严办，号召群众检举揭发驱逐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随后，在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各单位，各村、街道和路口，都专门设置了一种特制的木箱——控告箱。

很快就有人举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由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叶坪村，因此谢步升有一定的个人声望，在中央政府内也有些熟络关系。这种情况给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一定阻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

赃枉法，这叫人民怎样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毛泽东更是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败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这样一来，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过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审理，认定谢步升的罪状如下：一、打土豪的财产归私有，吞没公款3000多毛（毫子）。二、他当村政府主席时，借主席的势力，强奸妇女，包庇富农，将富农改为中农，收受贿赂300多块大洋。三、收买群众的米，用大斗进，小斗（出），卖给“一苏大会”获利大洋270多块。四、偷了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印子，私打牛条过山贩卖，每头牛得大洋3元，总计得大洋33元。五、1927年9月在宁瑞交界处杀了贺龙、叶挺军队的医官，并拿了金戒指2枚，大洋5个，还有怀表、毡毯等物。六、以自己的小牛换了送往灾区的大水牛两头。七、1927年8月，伙同他人抢劫了瑞林寨邱姓的布店，把布、现洋、鸡、鸭、猪掳劫一空，他个人得赃款93块大洋……最终谢步升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的一切财产。

谢步升自认为对革命有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院审理谢步升案件，认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对谢步升的判决是正确的，决定按照原判执行。当日下午3点，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清脆的枪声，划过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枪。谢步升也成为我党在反腐败历史上被枪决的第一个贪官。

（摘自2016年7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